

清代狀元李振鈞的詩性養成 及其詩歌特性考論

郭鵬飛

提 要

道光九年狀元李振鈞著有《味燈聽葉廬詩草》二卷，在後期作品大量散佚的情況下仍存詩四百餘首。李振鈞的人生境遇、詩性養成與科舉考試密切相關，他的詩是窮而後工的表現。詩學上轉益多師，取法多變，而通籍後所作大概與陸游詩最為契心，故受陸詩的影響較大。遺憾的是，同處於晚清宋詩運動的浪潮中，由於種種原因，李振鈞卻是個邊緣人物。他的詩集經歷百年沉埋再見于世，雖未給人以滄海遺珠的驚喜，但仍不失為晚清文學史研究的一個有價值的案例。

關鍵詞：李振鈞 味燈聽葉廬詩草 科第 陸游

李振鈞(1794—1839)，字海初，號守石道者。安徽省太湖縣人。道光九年(1829)，成為清代第七十九位狀元，也是太湖縣繼趙文楷之後第二位狀元。歷任翰林院修撰、國史館和功臣館纂修、文淵閣校理。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任順天鄉試同考官。¹ 以直忤時，鬱鬱而卒，年僅四十六歲。² 有《味燈聽葉廬詩

1 李振鈞履歷見符兆鵬《太湖縣志》卷十七，同治十一年刊本。

2 按，奧肯國際影印本所附《年譜》將李振鈞卒年誤作“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四十五歲”，當作“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四十六歲”。寶璽序中稱“先生下世垂五十年矣”，序作於光緒十五年(1889)，所以推五十年即道光十九年卒，享年四十六。與符兆鵬(轉下頁)

草》兩卷。

一、詩集編訂與作品散失

《味燈聽葉廬詩草》兩卷，光緒十五年(1889)刊本，是在門人寶鑿的主持下刊印的。據寶鑿序及李德星跋文可知，約在光緒五年(1879)，時二十多歲的李德星以優貢生身分北上應試，期間將其祖父遺稿交給新晉太子太傅的武英殿大學士寶鑿並請勘校。十年後寶鑿已致仕，因擔心業師遺作殘失，遂將此詩稿印出。³ 1925年，李德星從同治本《太湖縣志》中輯出李振鈞作于道光九年的紀恩詩17首，仍名《瀛洲草》，鉛印重排，附錄其後。末有跋文稱，“往歲，德星以優行貢成均，入都，應朝試，攜殿撰公遺稿乞寶相國弁言。嗣是屢躋秋闈，未與計偕北上，寶公懼日久稿本殘失，代付手民。……原刻標有《瀛洲草》，稿多散佚不全，續搜邑乘(原誤作秉字)，得當日臚唱後紀恩詩若干首，因補入之。”⁴

又，李振鈞《自序》謂“乙酉冬，圍爐枯坐，哀集而芟汰之，僅存若干首，名曰《味燈庵詩草》。”此為首次結集，乙酉即道光五年(1825)。寶鑿《序》稱“嗣改曰《味燈聽葉廬詩草》，然通籍後所作，多散佚不全。”所以，乙酉年後李振鈞曾再次增訂了他的詩集，並為之改名，仍用原序。考齊彥槐《題詞》“挑燈閒讀《味燈庵》”、“君年十九梁溪別，又別梁溪十九年”等句可知，增訂時間大概在道光十一年(1831)，李振鈞三十八歲。當時齊彥槐已年近六十，故結有“舊梁溪吏已華顛”之句。而齊氏《題詞》仍稱“味燈庵”，可見改齋號為“味燈聽葉廬”乃在此年之後。據此，《味燈聽葉廬詩草》應為李振鈞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增訂並定名的稿本。

(接上頁)《(同治)太湖縣志》中《李振鈞傳》謂“年未五十，遽卒”正相合。本文所引李振鈞《味燈聽葉廬詩草》為奧肯國際2015年影印本。下文簡注作《詩草》頁某。

3 此光緒十五年木刻兩卷本，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日本同志社大學等高校圖書館均有收藏。

4 《詩草》，頁206。

寶盞印兩卷本共有 419 首⁵ 詩，加上李德星所輯 17 首，共 436 首詩。今檢孫雄《道咸同光四朝詩史》甲集卷一亦選有李振鈞通籍後詩 5 首，皆為集外詩。又莫真寶先生從民國何仲琴編《艷語》（上海廣益書局 1915 年版）中輯佚得《嘲新詩》七絕 3 首、《香閨韻事》七律 4 首，合計有 448 首詩。另外，《詞綜補遺》收錄李振鈞詞《南浦》1 首，並謂“有《味燈聽葉廬詞鈔》”。⁶ 又，同治本《太湖縣志·藝文志》僅著錄“李振鈞《味燈聽葉廬詩鈔》”，未云卷數。清人孫雄《道咸同光四朝詩史》謂李振鈞“有《味燈聽葉廬詩集》四卷”，⁷ 從孫氏所選錄的 5 首集外詩可知，他所見鈔本所收似較為豐贍。在兩卷本《詩草》卷下 9 個小集 239 首詩中，僅通籍後所作就有 126 首（《瀛洲草》7 首、《錦車吟》49 首、《北上雜詠》70 首），占了卷下作品數量的一半以上。若加上紀恩詩 17 首、孫雄《四朝詩史》的 5 首（皆通籍後作），就有 148 首，占今存全部詩作的三分之一。

李振鈞去世後不數年，南方便爆發了太平天國運動。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攻佔安慶、蕪湖等地，生靈塗炭，文獻亦遭大劫。據《太湖縣志》載，李振鈞的詩“存稿甚富，兵燹大半散失”。⁸ 由於李振鈞後期的大量創作在生前未及時編定，去世後也無人整理，一直以稿本流傳，加上後人避亂逃亡，這些作品大半散失恐怕是難免的。今檢《詩草》卷下，後期作品寥寥，可見《縣志》所云“大半散失”，當屬實錄。這也表明，李德星早年帶去寶盞處的詩稿大體就是李振鈞最後所編的稿本。

在李氏著作大多散失的情況下，這兩卷詩集無疑成了今人瞭解其生平行實、思想情感至為珍貴的文獻。李振鈞雖貴為狀元出身，但仕途生涯平淡無奇，建樹亦寡，以至於有材料甚至稱他是“清代最無影響的狀元之一”。⁹ 首先是因為他通籍較晚，履歷未豐，不幸早卒；其次是以直忤時，得罪權貴，懷才不遇；第三是性格兀傲、多情善感，不好相處。所以，李振鈞雖以世家子而通科籍，以

5 此統計包括卷上 13 個小集 180 首（《結腸集》騷體詩計作 7 首）、卷下 9 個小集 239 首。

6 見林葆恒輯、張璋整理：《詞綜補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2644。

7 孫雄：《道咸同光四朝詩史》甲集卷一，清宣統二年（1910）刻本。

8 符兆鵬等修：《太湖縣志》卷二十二，同治十一年刊本。

9 周臘生編著：《清代狀元奇談·清代狀元譜》（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4 年），頁 267。

欽點狀元之盛名而任修撰，平生所歷不可謂不幸至極！但他又因不通世故，因而交游不廣，于主流詩壇、政治圈皆較為疏遠；又因生性兀傲，進而得罪權貴，於是憤世嫉俗之情日深，于人于事皆過於敏感，不得不一寄於詩。這樣的境遇，作為一名政客，其結果是不幸的；但作為一位詩人，大概也是不幸之幸吧。

二、詩性養成與科第境遇

李振鈞出生在一個顯貴世宦之家。他的父親、兄長及親友中有不少是進士出身。¹⁰ 就像是命中注定的，李振鈞在如此家庭環境全面的薰染下，自小就以經國濟世為遠志。李振鈞三歲時，家鄉出了一名狀元趙文楷，文魁出現在身邊對當地所有的學子而言都是既真切又振奮的事，因此趙氏自然就成了少年李振鈞讀書立志的榜樣。李振鈞七歲時就寫出了一首比較像樣的五絕，塾師劉國策（號香芸）¹¹ 雖然喜歡，卻“頗不欲其專務也”。¹² 顯然振鈞父李長森和劉先生都希望他能專心科舉，順利登上仕途。事實上，舉人出身的劉香芸也是一位詩人，¹³ 他對李振鈞在學詩上必然也產生過積極的影響。

李振鈞十七歲與汪正珠結婚。汪氏大他三歲，是李長森同朝為官的好友汪志伊的掌上明珠。她知書達理，持家有方。相比之下，李振鈞則頗有些任性。據振鈞《悼亡四首》小序稱：“予素任性使酒，而孺人守禮無嫚色惰容。小不合，能順受之。吾母知而讓予，反引咎焉。”¹⁴ 可見，李振鈞當時任性使酒，並不很懂

10 在李振鈞進士及第前，太湖沖李家已有李長森及其子侄輩共七人中了進士。

11 按，劉國策（1765—1826），字簡堂，號香芸。安徽太湖人。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恩科舉經魁。嘉慶十九年甲戌成進士。官四川梓潼縣知縣，有政聲。卒於官。（參吳坤修《重修安徽通志》卷一百八十一，光緒四年刻本）李振鈞有《挽劉香芸夫子》詩作于道光六年（1826），可知劉卒於是年。又，注云“先生五十成進士”，可推出劉香芸的生年為1765年。又，李振鈞《挽劉香芸夫子》注云：“鈞八歲時，隨侍萊州觀察署。先生課讀于古藤書屋者三載。”李振鈞《自序》稱七歲時，劉已授業，所以劉香芸擔任塾師在嘉慶五年至嘉慶八年，前後約三年時間。大概劉香芸此前參加嘉慶元年、四年、嘉慶六年（恩科）會試皆不第，所以李長森乃延請他擔任李振鈞的塾師。

12 《詩草》自序。

13 劉香芸詩，見《（同治）太湖縣志》卷四十三《藝文志》。

14 《詩草》，頁40。

事。李雖非紈袴之輩，但畢竟出身世家，條件優渥，所以有些任性也在情理中。同年秋，與妻兄汪渙之赴順天鄉試，不中。李振鈞《小步》詩有“窮陋易降辱，顯達忘辛艱”之句，心態較平和。後來又有“三載報政逝將去，四時讀書聊可樂”（《家大人命賦來青室謹成長歌》）之句，表明此後三年讀書有了新的長進。隨父北上所作《漂母祠》一首也可以看出他的進步。

嘉慶十八年（1813）秋，振鈞第二次鄉試，仍未中舉。七古《贈章管籥》一首作于次年，其中有云：

我自五齡入小學，經史十五通其辭。
萬言已試書三上，廿載相隨酒一卮。
秋華春月年年度，烏帽緋衣事事違。
文章有命誰青眼，富貴如雲自白眉。
譚深不惜出肝膽，虛名安用求人知。¹⁵

前三句說自己讀書經歷和文才，第四句轉折說自己二十年來無所成就的苦悶。後面四句多屬牢騷語，充滿了懷才不遇的憂傷，既渴望功名，又強為豁達之語。可見，李振鈞的仕途志向是很堅定的。

嘉慶二十年（1815），因髮妻病重，妻兄來接回福建療養，至仲冬病逝於閩。李振鈞聞訊哀慟不已，《悼亡四首序》云：“斷弦之彈，調難成聲；孤鴻之噉，憐還顧影，亦韓子所謂言有窮而情不可終者耳。悲夫！悲夫！”¹⁶為此，他寫了二十多首悼念亡妻的作品，後來編作《結腸集》。該集不僅是對亡妻的追憶和哀思，從《自傷》《自解》《重遣》等詩題看，不少作品也是對自己從前任性、少不更事的自我反省。可以說，《結腸集》是李振鈞詩集中最獨特、最感人的、最具代表性的小集。《魂歸來歌序》云：“亡婦櫬歸自閩，生去死還，慘裂心肺，幽靈有覺，亮（諒）亦同之。”¹⁷集中詩更是字字血淚，感人肺腑，可見李振鈞慟懷之深，感

15 《詩草》，頁32—33。

16 同上，頁41。

17 同上，頁46。

傷之重。《悼亡四首序》對妻子任勞任怨，勤儉持家的形象作了細緻的描寫：

孺人貞慧，寡言笑，受《女誡》《家範》諸書于父，亦解韻語，以為非婦人事不竟覺也。為女時，諸嫂妯娌最多，能周旋其間，無詬誶聲，弗輯者久亦化焉，有女師之稱。予素任性使酒，而孺人守禮，無慢色惰容，小不合能順受之。吾母知而讓予，孺人反引咎焉。性謙和，尤勤儉，烹飪、紡織咸能為。奩具、衣珥，恒卻弗御，然施予貧者弗吝。曰：“吾多病，知能用幾何？於吾損一銖，若輩直增一斤矣。”其節已惠人多類此。¹⁸

組詩《重遣》則用七絕的體裁回憶了夫妻曾經情投意合，相處無間的美好生活，亦無不飽含深情，使人唏噓。如第六首云：“不薄傭春願鋤耕，每逢下第下機迎。閨中從此無知己，豈為牛衣夜半情。”¹⁹詩中描寫妻子勤儉持家，即使丈夫兩次落第亦無輕倨，於今這位閨中知己已隔黃泉，詩人內心的悲戚又豈是牛衣之泣所能比的？“近年況復淚容多”，²⁰便是這段時間生活的寫照。論纏綿悱惻，傷情最重者莫過於《魂歸來歌》，其辭撕心裂肺，一歌三哭，七歌而終，描述了從靈柩來歸到下葬祭奠的過程，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另外，《結腸集》的命名可能就是從《魂歸來歌》的結句“古有空同兮賦結腸”一句來的。因為對亡妻真摯的愛與悼念是來自內心的真實，詩人已無意去追述悼亡詩的源流、思考悼亡詩創作的藝術問題，而一以表現內心真實為出發點。從這個意義上看，李振鈞悼亡詩未必不如元稹等人，完全具備抗席古今同類作品的藝術價值。²¹

嘉慶二十一年(1816)秋，喪妻後的李振鈞第三次參加江南鄉試，仍不中。此後，李振鈞又分別參加了嘉慶二十三年(1818)萬壽恩科鄉試、二十四年己卯(1819)鄉試、道光元年(1821)恩科鄉試、道光二年壬午(1822)鄉試，六年中除

18 《詩草》，頁39—40。

19 同上，頁54。

20 同上，頁54。

21 彭敏哲《論李振鈞的悼亡詩》(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2016年第2期)、趙娣《論李振鈞的悼亡詩》(《池州學院學報》2016年第4期)都對李振鈞的悼亡詩進行了研究。

了兩次正科，還幸運地遇到兩次恩科，可以說是非常難得的好機遇了。不過李振鈞仍屢試未中，其父李長森也帶著遺憾下世了。嘉慶二十四年，李振鈞經歷了第五次失敗，有《下第》詩云：“小謫人間廿六年，狂吞酒海狃詩天”，²²豪言壯語所描述的是以酒澆愁，以詩遣懷的潦倒心緒。《檢詩稿偶成》《續夢中句》《更得一首》等詩哀感而沉鬱，似狂而多讖語，幾乎首首不離酒字，其意志之消磨，情境之頹喪，讀之令人生憂。不過，此時的詩歌語極工致，直抒性情，已然脫去模仿痕迹，更副以才學，可謂是“窮而後工”的結果了。其中更有像《美人十八首》這樣的聯章體式的大作，才華卓犖之姿於焉可見。以上是詩集上卷的大致情況，惜存稿不多，所展現的生活圈也較狹窄。

《梅花書屋唱和集》是下卷第一個小集，作於道光五年乙酉（1825），是李振鈞第八次鄉試前後，與友人酬唱贈答的作品。共有十九首詩，其中七律十七首。集中不僅流露著對科場的灰心失意，同時也閃爍著不甘於埋沒的星火之志。前一年父親李長森過世，而李振鈞也已過了而立之年。此集之後，李振鈞即參加了第九次鄉試（道光八年），沒想到竟一舉高中，三戰聯捷，名動天下。因此，該集仿佛是作者人生境遇的過度一樣，成為了前後兩卷詩草的分界線。

父親去世後，李振鈞的壓力更大了，加上一些打退堂鼓的同學的消極影響，是否還繼續應考成了他一度十分糾結的問題。例如，《秋試留別諸友》詩云：“欲去牽于友，不去牽於名。名成未可必，友別難為情”，²³當時心情於此可見。《夜坐感懷》一組七律五首，應作於秋試後，句雖整飭而慷慨，心緒則頗複雜。例如末一首云：

荏苒流光去莫追。潘郎今已鬢成絲。
得原非福失猶幸，壯不如人老可知。
一代風流能有幾，千秋事業未為遲。
文中飛將詩中史，俯首眉山進一卮。²⁴

²² 《詩草》，頁 62。

²³ 同上，頁 99。

²⁴ 同上，頁 101。

歲月蹉跎，人到中年，振鈞此時的心灰意冷可以想見。科場風流並不是人人都有這個命的，那還不如好好寫寫詩，考慮一下千秋事業著文章呢！前一聯更似讖語，得到了未必是福，得不到也許是幸，壯年不如別人，老年更可想而知了。他把精力轉到了學習蘇軾的詩文上來，稱讚蘇軾的文章可比飛將軍，詩歌堪比老杜，才是他真正值得一生俯首的人物！

此後的《餘園詩存》《徂東後集》，相較之下更覺沉穩，且自信心明顯有所提高。例如，《贈壽民兄用竹醉兄韻》有句云：“逼人富貴終由命，遲我公卿好讀書”，²⁵又《少雲作小照予題為衆妙圖賦贈三首》有句云：“呼我為狂我不辭，更無人道只君知。”這等心態自然是成熟而自信的。當時同鄉中有不少人和他一樣考了很多年都未中試者多已絕意仕進，不再應考了。儘管如此，李振鈞仍未絕望，又一次與好友李國杞、孫登年等人整裝北上。沒想到這次李振鈞終於三戰聯捷，並成了欽點狀元！三人中獨孫氏會試落第，從此不再赴考，後以舉人身分選了個教諭。據《當塗縣志·孫登年傳》載：

孫登年，字寄鶴，號永之。性渾噩豪邁，遠聲色，薄榮利，以文名馳驚遠近。不事家人生產，人以為癡，弗顧也。道光戊子科，領鄉薦。與同年太湖李振鈞、李國杞諸名士為詩酒交，三人常自豪，以三鼎甲相期許。及春闈榜發，鈞果大魁天下，杞亦聯捷庶常。獨年報罷，以此絕意進取，官東流教諭。²⁶

他們互為詩酒之交，舉道光五年鄉試之後，“常自豪，以三鼎甲相期許”。可見時來運轉之時，三人意氣之豪邁，躊躇之滿志。多年的挫折無不深化了他們對人事的感悟，刺激了他們的創作衝動。孫氏僅有易學著作傳世，詩集或已散佚，而李國杞則著有《挹爽樓文稿》《花竹齋詩集》《花影庵詞》等詩文集。

詩文創作與科舉仕進並無衝突，歷史上不乏進士出身的著名詩人，但人的

²⁵ 《詩草》，頁97。

²⁶ 陳鵬飛編：《當塗縣志·人物志·文學》，鈔本。

個性與官場升沉卻有著一定的關聯。李振鈞性格兀傲不羈，喜議論是非，言語剛直又不拘小節，恐怕並不是很適合官場上的應酬。門人寶鑿在《味燈聽葉廬詩草序》中稱：“（先生）性傲岸不羈，語言戇直，不合于時。憶某年，忽遣一青衣招寶鑿往，縱談竟日，幾謂宣武坊南無足語者。其生平落落寡合可知矣。”李振鈞性格兀傲，出語無忌，可見一斑。又如《奉酬竹醉兄即事原韻》詩有云：“豈因人熱甘投刺，總受師恩不借名”，²⁷雖言友人，實亦他自己性情之寫照也。時人方濬師在《蕉軒隨錄》中也寫道“殿撰李海初先生振鈞性通脫，不拘小節”。²⁸方氏于李振鈞為晚輩，對振鈞性格的描述幾乎和他人看法完全一致，恐怕不是偶然的。同治本《太湖縣志》有傳云：

李振鈞，字仲衡。長森次子、振祐弟。道光己丑科，以第一人及第。湖邑自嘉慶元年後，卅餘年中，兩掇大魁，人文蒸蒸日上。而振鈞才名尤藉甚，天資絕特，詩文若夙構，使酒淋漓，意氣不可一世，人亦無敢抗手。少隨親宦遊，足迹半天下，所交多名流，久躡名場，志不少挫。²⁹

顯然，一方面出於家庭環境薰陶，李振鈞學識淵博，所交皆名士，另一方面在隨侍父親宦游期間亦得江山之助，眼界頗廣。儘管多次參加鄉試不第，在讀書和遊歷中，他的詩心卻得到了豐富的養分，識見也日有加深。

進入官場後，果如失意時自省的那樣“得原非福”，仕途並沒有給他帶來很多快樂。門人寶鑿《味燈聽葉廬詩草序》中稱：“某年廷試，閱卷者擬刊列高等，有某某與先生有隙，識其字迹，抑置之。先生以是鬱鬱，不數年，卒。”³⁰後來徐世昌《晚晴簃詩匯》李振鈞小傳中也指出“大考為忌者所抑，鬱鬱以終”。³¹這

27 《詩草》，頁96。

28 方濬師：《蕉軒隨錄》卷十《倭文端公》。

29 符兆鵬等修：《太湖縣志》卷二十二，同治十一年刊本。

30 寶鑿《味燈聽葉廬詩草序》，《詩草》卷首。

31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百三十五，民國退耕堂刻本。

些文字都輕筆帶過，李振鈞去世五十年後，寶璽作序仍攝於“某某”的影響而含糊其辭，隱晦其名，可以看出此權貴人物影響之大。³²

齊梅麓為李振鈞詩集《題詞》有“國家科第宜風漢”一句，自注云：“‘國家科第與風漢’，放翁句也。海初頗有風漢之意，故云。”此處頗值得玩味。陸游原詩題目較長，謹錄如下：

陳阜卿先生為兩浙轉運司考試官，時秦丞相孫以右文殿修撰來就試，直欲首選。阜卿得予文卷，擢置第一。秦氏大怒。予明年既顯黜，先生亦幾蹈危機。偶秦公薨，遂已。予晚歲料理故書，得先生手帖。追感平昔，作長句以識其事，不知哀涕之集也
冀北當年浩莫分，斯人一顧每空群。
國家科第與風漢，天下英雄惟使君。
後進何人知大老，橫流無地寄斯文。
自憐衰鈍辜真賞，猶竊虛名海內聞。³³

詩題記述了陸游當年參加禮部考試，時秦檜之孫亦同列席中，秦檜欲指定其孫為首選，但考官陳阜卿先生堅持置陸游第一。陳由此得罪秦檜，後與陸游均仕途不暢。許多年後陸游乃作此詩以感激當年的知遇之恩，亦悲其身世。“國家科第”一句典出唐無名氏《玉泉子》：“劉蕡，楊嗣復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時，中官尤所嫉忌。中尉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耶？’”³⁴“風漢”即瘋漢，指言行癡狂之人。中尉的意思是，怎能把國家的科第頒給這個瘋漢呢?! 可見，齊梅麓用此典極貼切有趣。顯然李振鈞躉直之名應是在通籍後不久以直言忤時，惹怒了某廷試高官所致，師友大都知道其事。李振鈞任殿撰

32 何鵬先生《李海初及其詩》一文謂李振鈞得罪的權臣即穆彰阿，載《何鵬文史論集》（安徽地方志辦公室印，1996年），頁561。

33 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四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2530—2532。

34 佚名撰：《玉泉子》，明稗海本。

近十年，竟因此鬱鬱而卒。

如果說李振鈞從未認識到自己性格與仕途的衝突問題，或未能接納師友親朋的規勸，那也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在他擔任館臣後已日益注意到這個問題，並有所收斂，而且表現還不錯，以至於師友們開始對他寄予了一定的期望。《太湖縣志》載，李振鈞“戊己遂聯捷，魁多士。既入館閣，心益下，才益斂，咸以遠大期之。”³⁵但是，這種兀傲不拘的個性不合於官場原是先天注定的，何況讓已年近四十的成人再努力收斂，學習圓滑世故，談何容易！李振鈞只好從此沉默寡言，惟以詩歌來紓解自己內心的壓抑與痛苦，作為一種終極的寄託與救贖。因此，在通籍之後的餘生中，李振鈞有大量的詩歌創作就容易理解了。

李振鈞的一生都為科第功名所羈絆。不第則失意愁苦，寄于詩酒；及第後則懷才不遇，難為世情。因此無論科第境遇的好壞，對於性格缺陷的李振鈞來說，都只能徒滋詩性。李振鈞並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才華與性情所在，並不是沒有認識到自己不合於官場，但因久為家庭環境的熏染，為社會風氣的脅迫，以及個人對功名的美好嚮往等等，無不逼使他勉強自己邁上這條路上奮力前行。

三、詩學轉移與宗宋問題

道光五年(1825)冬，李振鈞在其詩集《自序》中寫道：

余何敢言詩哉？然嘗論人之為詩，往往存門戶之見。夫使李、杜在宋，不失大家；蘇、陸生唐，自是初、盛。猶之夷、高抗行，巢、皓峻節，時代雖殊，情性則一。必拘拘於音調、格律以求合，是既束縛而又欲其馳驟也。雖然，余何敢言詩哉？潦倒中年，情懷蕭索，轉不若少時之天真抒寫，音律自諧。³⁶

³⁵ 符兆鵬等修：《太湖縣志》卷二十二，同治十一年刊本。

³⁶ 《詩草》，頁7—8。

雖然李振鈞聲言不欲有門戶之見,但仍不免受到時代的深刻影響而獲其烙印。他認為“必拘拘於音調、格律以求合,是既束縛而又欲其馳驟也”,言下有舒展性靈之意,且拈出“情性”一詞,殆與性靈派觀點為近。性靈說是清代前期四大詩歌理論(另三個是神韻說、格調說、肌理說)派別之一,以清乾隆時期的袁枚為主要代表,強調詩歌創作要直抒胸臆,表達真情實感,注重情感的自然流露,在當時影響很大。李振鈞感慨並肯定其少時所作“天真抒寫,音律自諧”,自是受到了性靈派學說的影響。

李振鈞對袁枚其人及其詩論顯然是很熟悉的,他的表兄顧槐三有個能詩能畫、頗富才華的小妾名佩湘,早年便曾是袁枚家中婢女。³⁷ 但與袁枚不同的是,李振鈞學殖更為深厚,即便在抒寫性靈表達真情實感的同時,振鈞仍能兼顧“以學為詩”的看家本領,而不至流於浮滑。

從《自序》也可以看出,李振鈞不欲立門戶之見,即表明他在學詩路徑上不重一體,不主一家,轉益多師,以求自成面目的觀點和實踐。但是個人的詩學探索畢竟離不開時代風氣的影響,下文將以李振鈞的作品為中心,討論他在詩學上的變化。除了時代風氣變遷的影響,作者在讀書與思考的同時,也會對前代以及整個詩學史有著階段性的個人理解與批評。這種理解與批評是發展的,不是一成不變的,也不應完全對等於人的生命歷程中的幼稚與成熟,因此本文暫將個人在詩學思想上的變遷稱作“詩學轉移”。

“性靈說”在袁枚的鼓吹下曾經風靡一時,但袁枚去世以後,他的隨園體卻忽然備受批評。反思的風潮聲勢漸起,連曾經傍戶自矜的門下弟子也多反唇相譏。要言之,袁枚所作詩與其詩論或不夠相稱,存在淫哇纖佻的弊病,詆之者目為“野狐禪”。加上袁枚為人又風流誕蕩,不崇禮教,在世之時樹敵較多,其詩論雖在論辯中大獲流行,而日久則流於俗套,令人生厭。李振鈞少年時代正是隨園體廣遭非議而漸至寢聲的時代。李振鈞受到性靈派的影響是必然的,但在社會風氣的影響下,他也有對性靈派的反思。

37 佩湘英年早逝,李振鈞曾奉表兄之請為佩湘所作《手把芙蓉朝玉京圖》題七絕十首,見《詩草》頁108。

例如《檢詩稿偶成》云：

其一

假我韶年悅性靈，候蟲時鳥發新聲。
漸知閱世黃梁熟，未肯饒人白髮生。
氣偶不平緣詠史，過猶可恕爲多情。
麤才敢問千秋事，也向旗亭浪得名。

其二

下簾悄坐夜燈昏，一卷焚香自討論。
得句每疑前輩有，感懷半爲少年存。
不來好夢南柯穴，曾上歡場北海樽。
多少未堪回憶處，英雄心事故人恩。³⁸

此詩作於二十七歲。詩中明說自己少年時喜歡性靈派的學說，但隨著閱世漸深，那些英雄心事也日加磨滅，故人恩情存於愧疚，因此在詩學上也有了新的觀點。

李振鈞的詩風雖有性靈派的影響，但這是階段性的，是有變化的。事實上，李振鈞從小受到的詩學教育是從模仿漢魏詩開始的，最初走的恰是明七子派所主張的路子。初學詩往往是擬古之作，在詩學思路和創作方法上遵照李攀龍、王世貞等七子派所指明的方向學習。從題材上看，李振鈞二十歲以前的作品以古體詩爲主，近體詩較少。此期，擬古作品較好的有《送汪均之內兄正鑿入閩》、《小步》、《漂母祠》等。徐世昌《晚晴簃詩匯》有選後二首，徐氏在《晚晴簃詩匯凡例》中說：“茲所採錄，不設成心。”³⁹不過或許是受到版本的局限，他所選的基本都是李振鈞早年模擬漢魏的習作，並不算振鈞最優秀的作品。

以古體詩爲例，李振鈞少時所作兩篇五古詩從漢魏五言詩入，至《送汪均

38 《詩草》，頁65。

39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民國退耕堂刻本。

之內兄正鑿入閩》一首則改習柏梁體，作七言古詩。此後又作《家大人命賦來青之室謹成長歌》七言古詩，同樣一韻到底。這表明李振鈞開始是從漢魏古詩入手打基礎的，先五言而後七言。先學漢魏，轉而學盛唐，同時也是受到七子派主張的影響。《漂母祠》一首便是改學唐法作轉韻體七古，並開始創作大量五七言律詩。

例如《陬溪晚泊》一首：

晚向灘頭坐，鐘聲出翠微。
巖低溪月小，煙重岫雲肥。
古樹群鴉噪，高天一雁飛。
急流燈影亂，知有釣魚磯。⁴⁰

此詩作於二十一歲，是典型的學唐路數，內容上描寫自然景物，思想上抒發閒適心情，一起一結皆唐人所慣用。而個別練字如“肥”、“噪”等處則是取法中唐，甚至也受到宋詩的影響。李振鈞自幼熟讀經史，故學唐學宋都頗輕便。從其創作來看，後來取法頗廣，由盛唐到中晚唐以至宋詩，皆有涉獵。而立以後，詩法益加精熟，境界較為開闊。

李振鈞早先受到七子派的影響自與家庭教育有關，後來對詩歌有了自己的理解後，往往堅持自出機杼，不拘于古，漸近自然。符兆鵬《太湖縣志》稱：“（李振鈞）詩初學明七子，而吐言天拔，不襲李、王面目，晚乃漸近自然。”⁴¹此語自是有一定根據的。今李振鈞詩集中幾無一首在詩題、內容、語言方面純粹的擬古之作，即便是學古，李振鈞也機杼自出，的確可謂是“吐言天拔，不襲李、王面目”。

事實上，有明一代的詩學主張正是以七子派的復古思想為主流，後來的公安派、竟陵派以至性靈派莫不是在繼承中加以批判，各領一時風氣。郭紹虞先

40 《詩草》，頁 28。

41 符兆鵬《太湖縣志·李振鈞傳》，同治十一年刊本。

生說“弇州(王世貞)的主張是如何呢?他是以格調說為中心,而朦朧地逗出一些類似性靈說與神韻說的見解,所以只是格調說之變。”⁴²王世貞並不認同一味地模擬古人,所以他也有些近於格調派和性靈派的見解。因此,李振鈞在學詩的過程中也有自然而然的過渡或兼采的表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並且他很重視避免淺俗。

從詩史上看,明代詩學以推崇盛唐為主流,至清代乃逐漸興起宗宋的風氣。清初,顧炎武倡學人之詩漸開學宋之先河,錢謙益主張兼采中晚唐而學宋,王漁洋以神韻說標舉唐音但也學宋,至查慎行、翁方綱,以及乾嘉間的舒位、黎簡等人也都有在宋詩上下過功夫。此期,沈德潛、袁枚等詩論思想作為某種補充促進了清詩的發展,但其理論式微後,更進一步引發了一場影響較大的宗宋思想在詩壇的孕育。這個胚胎便是在嘉道時期成形,而產生於道咸時期,幾乎與時代之大變局同步而行。有位著名的人物程恩澤,⁴³亦是皖人,他大力提倡宋詩運動,與著名學者阮元並為嘉道間儒林之冠。王揖唐《今傳是樓詩話》云:“有清一代詩體,自道、咸而一大變,開山之功首推吾皖程春海侍郎。”⁴⁴程恩澤只比李振鈞大九歲,他對宋詩的宣導,或許對李振鈞的詩學觀念產生過一定影響。

前文已提到,李振鈞的詩歌且以上下卷看,前後期已表現出明顯的差異。這種差異體現在作者表達自我的自覺性方面,他更加注重自我感情的表達,既不專心於擬古復古,也不描山摹月,更不標舉性靈,而是將自己讀書聞見、所思所想發之以詩,尋求自身面目。那麼,漢魏、盛唐再不足以展其懷抱,於是取法晚唐、宋詩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只是李振鈞走的與不少宋詩派高舉江西大旗、恆以學問為詩者不同,他學的是蘇軾、陸游等宋人的詩歌。從風格上看,李振鈞詩語言自然曉暢,不刻意用僻典,其詩雋秀、雄健、清新、奇麗。就詞淺意新的角度看,的確與陸游很像。例如《舍弟九煙補葺來青之室墨樵以詩賀之約予同作

42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年),頁390。

43 程恩澤(1785—1837)字雲芬,號春海,安徽歙縣人。嘉慶十六年進士。工詩,精於考據。為近代宋詩運動宣導者之一。

44 王揖唐《今傳是樓詩話》,載《民國詩話叢編》第3冊(上海:上海書店,2002年),頁263。

墨樵與予兄弟交最密明年將授館他氏臨別贈言當不僅以詞章相勸依韻奉和別墨樵兼示九煙》其一云：

兩載論交一草堂，匆匆書劍伴行裝。
無多知己餘青眼，未可逢人太熱腸。
好月肯教容易滿，名花不作等閒香。
趁今拚取千杯醉，別後方知況味涼。⁴⁵

前文提到陸游本是當科狀元，因權相秦檜無恥干預而被換掉。李振鈞此時尚未中舉，但也可以看出他對陸詩心領神會之處。以此詩為例，可以看出李振鈞對陸游的惺惺之意。用“書劍”比喻個人才華，也是陸游所常用的意象，如《書劍》一詩起句云“書劍當年遍兩川”，又有“一生書劍遍天涯”“當年書劍揖三公”“書劍萬里行翩翩”等等；此詩外，李振鈞另有句云“匣中劍氣凝寒水”（《有感》）。陸游詩也頗喜以“名花”自比，如“折得名花伴此翁”“為愛名花抵死狂”“每為名花秉燭游”“名花未落如相待”等等，自是寄託美人香草之意；李振鈞亦有句如“名花高士二難并”（《題齊梅麓前輩梅花居士圖》）。振鈞後期創作頗有脫胎陸游之處，似乎隱含著一種異代知己的同情。

和李振鈞同時代的程恩澤、龔自珍、⁴⁶何紹基、⁴⁷曾國藩、⁴⁸魏源、⁴⁹鄭珍、莫友芝等人在詩歌創作和詩學思想上大力主張宗宋，為後來鄭孝胥、陳三立、陳衍、陳寶琛等同光體詩派的流行開啓了先聲。提倡宋詩自有深刻的時代背景，但遺憾的是李振鈞卻不是宋詩運動的鼓吹旗手。李振鈞學宋的創作實踐雖看

45 《詩草》，頁 103。

46 龔自珍(1792—1841)字璣人，號定庵。浙江仁和人。詩人，思想家。道光九年進士，與李振鈞為同年。

47 何紹基(1799—1873)，字子貞，號東洲，別號東洲居士，晚號蝮叟。湖南道州人。詩人、書畫家。道光十六年進士。

48 曾國藩(1811—1872)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政治家、文學家。

49 魏源(1794—1857)名遠達，字默深，號良圖。湖南邵陽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啓蒙思想家、政治家。與李振鈞同齡。

似宋詩運動同聲同氣，但因未能加入到宣南詩人群體之中，思想較為狹隘，不幸早卒，因此也沒有在學宋的路上取得太大的成就。

道光十二年，齊梅麓為李振鈞詩集題詞云：“好句居然似放翁，豪情亦與放翁同。國家科第宜風漢，破浪堪乘萬里風。”⁵⁰齊氏反復指出李振鈞詩與陸游的相似性，可謂是李振鈞的知心者了。從李振鈞的詩學轉移的角度看，原本明七子派對放翁詩也是極為看重的。錢仲聯先生曰：“後七子的首領王世貞也不得不承認他（陸游）是‘廣大教化主’。”⁵¹

鑒於李振鈞從最初取法七子派，到兼采性靈諸說，復以其學養自成面目的詩學轉移經歷，我們可以看到他自漢魏、盛唐，延至中晚唐，兼汲于宋詩的轉益多師的詩學門路。而《自序》中所提到“李、杜在宋，不失大家；蘇、陸生唐，自是初、盛”的說法，即表明李振鈞兼采唐宋，包收並蓄的詩學主張。李振鈞通籍後的心路與南宋的陸游有幾分相似，因此陸詩對李振鈞後期創作有較大影響。李振鈞隱有“以陸證心”、將陸游視為千秋知己的傾向，可惜後來所作大都散佚，僅存吉光片羽。《味燈聽葉廬詩草》沉埋百年，2015年才由太湖縣後人影印出版。從目前存世的作品看，他的詩歌創作轉益多師，後期創作已具自己面目，取得了一定成就。不過，平心而論，《詩草》雖沒有給人以滄海遺珠的驚喜，但仍不失為晚清文學史研究的一個有價值的案例。

（作者：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作者按：本文初稿作於2016年3月，於2017年底修訂。

50 《詩草》頁9。

51 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1。

引用書目

- 李振鈞：《味燈聽葉廬詩草》。奧肯國際 2015 年影印本。
- 符兆鵬：《太湖縣志》。清同治十一年刊本。
- 孫雄：《道咸同光四朝詩史》。清宣統二年(1910 年)刻本。
- 陳鵬飛：《當塗縣志·人物志·文學》。鈔本。
-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民國退耕堂刻本。
- 林葆恒輯、張璋整理：《詞綜補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 周臘生：《清代狀元奇談·清代狀元譜》。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4 年。
- 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 何鵬：《何鵬文史論集》，安徽地方志辦公室印，1996 年。
-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 年。

An Examination of Li Zhenjun's Poetic Cultivation and Idiosyncrasy

Guo Pengfei, PhD stud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Ranked number one in the nation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of the ninth year of the Daoguang reign period (1829), Li Zhenjun is the author of *Drafted Verses of the Studio of Tasting the Lamp and Listening to the Leaves* (*Weidengtingye lu shicao*) in two fascicles. More than 400 poems are still extant even though most of his works dated from his later years did not survive. The nation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Li Zhenjun's life and the formation of his poetic cultivation. His poetry is a realization of the common theory that "one's poetry excels only when one becomes disillusioned." In poetics, Li emulates several masters and adopts a variety of methods. His poems written after taking office became a close match with Lu You's, as a result of the profound influence from Lu. Unfortunately, for some reason Li was marginalized in the Song-dynasty *shi*-poetry movement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After a century of obiviation, Li's oeuvre was rediscovered. Although it has not been a great surprise, it serves as a valuable resource for a case study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late Qing period.

Keywords: Li Zhenjun; *Drafted Verses of the Studio of Tasting the Lamp and Listening to the Leaves* (*Weidengtingye lu shicao*); nation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Lu You